第 8 期
（总第 37 期）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本刊刊头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题写

文匯 中國書畫
Wen Hui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总策划：张　梅
淮海文化传媒研究院
组　稿：王宝安　林水土
视　觉：黄勇强
电　话：021-62476708
E-mail：zgsh@whb.cn

艺坛佳话

道缘亦随　义薄云天

——吴昌硕和王一亭的情谊

王琪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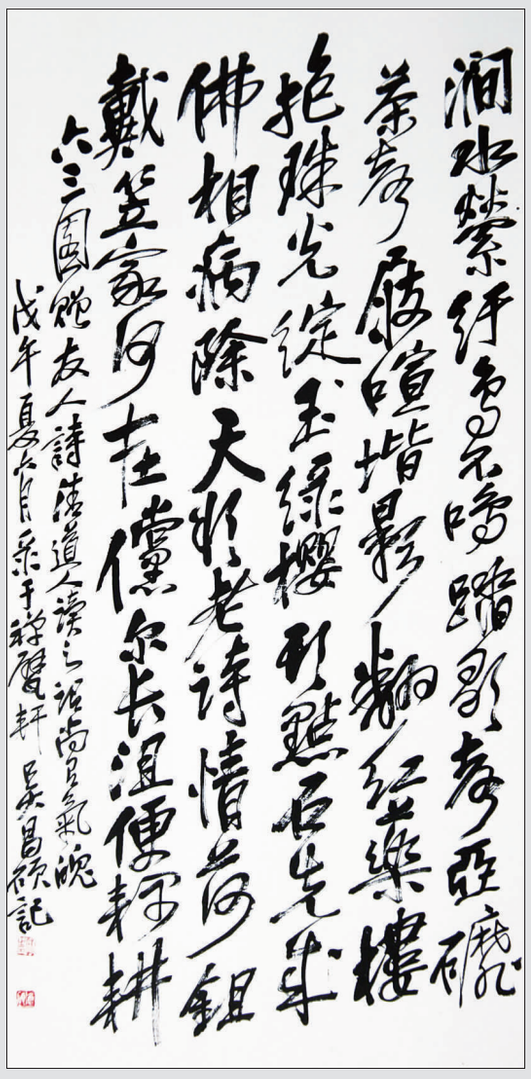
今年是海派的两位大师吴昌硕逝世 90 周年、王一亭诞辰 150 周年。

解读岁月所赋予的称谓，常常是包含着深邃的历史意蕴、丰厚的人文内涵及高迈的价值取向。吴昌硕与王一亭曾被称为“海上双璧”，其身份界定是：吴昌硕是海派书画领袖，王一亭是海派书画领军。在清末民初的风云际会中，他们心心相印、以沫相濡，诚如古老的《周易》所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把海派书画家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和而不同、海派无派，高扬起振兴中华艺术的旗帜，共同创造了海派书画艺术的辉煌。正是当年海派书画家们的这种协作互助、团结友善的精神，产生了相应的群体效应、团队力量和社会作用，使海派书画艺术不仅拥有了高原，而且出现了高峰，激发了群体活力和创造能量。而这其中，吴昌硕与王一亭无疑起到了表率作用。

◀吴昌硕肖像图（任伯年画竹，王一亭画吴昌硕像，吴昌硕题长跋）

▶吴昌硕王一亭合照

▲桃实图（中国画）吴昌硕作



◀吴昌硕书法作品

最近在上海文史馆推出的纪念吴昌硕逝世 90 周年、王一亭诞辰 150 周年的《古意盎然——吴昌硕王一亭四代及友人书画展》中，有一幅海派三杰的联袂之作是值得关注的。这即是《缶翁小像》，吴昌硕在题跋中深情地写到：“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余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甲寅秋七月，老缶题记，时年七十又一。”此段题跋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王一亭是吴昌硕学生之误传，缶翁明确地写着：“一亭，余友也。”“先生”即任伯年“师友之间也。”更重要的是缶翁旗帜鲜明地提示了他们的交友结谊观是：“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而“道缘亦随”，正是那个时代海派书画家们共同的交友结谊观。道，即是共同的追求。缘，乃是情分的展示。历史地看，以“海上双璧”为首的海派书画家群体，正是凭借着“道缘亦随”的理念，才产生了社会群体巨大的凝聚力、团队艺术勃发的创造力及流派谱系深远的影响力。

结交海上　互为知己

吴昌硕与王一亭的友谊之船起航于何时？也就是说吴王在哪一年开始结交契盟？对此历来众说不一，但我在撰写《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评传》时，对此专门作了考评。因为，吴王的结谊，对于海派书画来讲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将有力地推动海派书画的发展，而且为其鼎盛期的到来作了历史的铺垫和艺术的推动。

从具体的史料来看，吴昌硕、王一亭相识于 1909 年 3 月成立的豫园书画善会，这是海派书画家第一个真正的慈善组织，由海派书画名家钱慧安、杨逸、高邕、王一亭、蒲华、张善孖等人发起。当时的吴昌硕虽然住在苏州，但他时常往来上海，亦参与了发起筹备。因而在豫园中的得月楼会所晤面相识，但这仅是一般社交场所的点头之交而已。1910 年 3 月 6 日下午，中国书画研究会在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举办上海书画出品会，作为第一批会友的吴昌硕不仅有书画作品展出，而且参加了当日活动。王一亭时任书画研究会的董事，尽管当时的总董是汪渊若，总理是李平书，协理是哈少甫，但实际负责运作的是王一亭。吴昌硕书画篆刻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风格使当时审展的王一亭十分敬佩赏识。遂于当日的活动中与吴昌硕颇多交谈，了解了吴的人生经历和从艺简况，是为订交。

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吴王的订交应是在辛亥年，即 1911 年，其依据是吴昌硕为王一亭所写的二篇传记。一是缶翁于 1921 年所写的《白龙山人传》：“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互接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二是缶翁于 1925 年所写的《白龙山人小传》中曰：“余于甲寅秋（此是缶翁笔误，应是辛亥，甲寅系 1914 年）国变后移家海上，始晤山人，意一经商巨擘耳，久久过从，乃知山人有了解智慧。”从吴昌硕的客观叙述及对王一亭人品艺品的评价来看，这绝不是订交所能达到的程度，而是深交后的感受。因此，吴王的深交是始于 1911 年的辛亥秋及 1912 年 5 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之后，即“久久过从”。而海派书画流派纷呈、佳作迭出、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的兴盛局面，就是以 1912 年为起始的。

推介盟主　甘为辅佐

历史的转机、艺术的嬗变常常离不开时代的契机。吴王深交的 1912 年，正是中华民国元年，农历壬子年。吴昌硕也就在这一年弃名“俊卿”而改以“昌硕”行世，并自刻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而当时的海派画坛也正面临着历史的大转折。原先一批大师级的画家先后归道山，如任伯年（1895 年）、胡公寿、虚谷（1896 年）、蒲华、钱慧安（1911 年）等。而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清廷的高级官吏、名流鸿儒因清朝的倾覆而来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如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曾熙、朱祖谋、康有为等，他们这批人是“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他们在上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加盟了海派书画家的队伍，从而使这个流派呈现豪华的阵容和顶级的组合。正是在这纷繁多变的形势下，王一亭敏锐地意识到海派艺坛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一位巨擘级的领袖人物来举旗引领。

正是通过与吴昌硕的订交、深交，王一亭不仅认识到吴昌硕在诗书画印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创新，被称为“当朝艺坛四绝”，而且学修深厚、人脉广泛、人艺俱老，更重要的是为人友善、胸襟开阔，有家国情怀，无疑是相当合适的海派书画盟主人选。为此，王一亭与吴昌硕倾心交谈，力邀缶翁“移家海上”，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和经济上的支持，还在上海的艺界、商界、社交界大力推介吴昌硕。我曾就吴昌硕“移家海上”之事专门采访缶翁的孙子吴长邺先生，据他说：“当时吴昌硕初到上海，刚开始画卖得也并不好，是王一亭悄悄地吃下（买下）一批，以安老人之心。”客观地讲：王一亭当时已是海派书画的大腕，社会的名流、商界的巨擘、督府的高官，但他对吴昌硕却敬重有加、多方帮助、甘为辅佐、推为盟主。如果历史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身在苏州的吴昌硕见上海已成繁华都市而到黄浦江畔鬻艺，而王一亭作为当地书画界的大腕，如心胸狭窄，争权夺利，唯我独尊，他就会极力排挤缶翁，使其难以立足。那么年迈的吴昌硕却只能回到苏州或终老于安吉。从而使海派群体失去一位杰出的领袖，海派书画失去一次提升的机遇。

吴昌硕定居上海后，正是凭借着其雄厚的实力、精湛的造诣、四绝的才能及王一亭的扶持，迅速在海上艺苑崛起。不仅使名家云集的海派书画队伍有了一个真正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引领能力，在风格构建上具有开拓作用，在群体组成中具有权威作用的领袖人物，而且为日后培养出了如陈半丁、陈师曾、张大千、于右任、刘海粟、徐悲鸿、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王个簃等这样一批大师级的精英艺术群体，支撑起了中国艺术百年的大师之门。

领袖群伦　义薄云天

王一亭对吴昌硕的辅佐推介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注重于缶翁领袖地位的奠定。自吴昌硕 1913 年出任“天下名社”西泠印社社长后，1914 年又被推为上海书画协会会长，1915 年被推为海上题襟馆会长。同时，吴昌硕亦是豫园书画善会的发起者，海上九老会（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康有为、朱祖谋、郑孝胥等九人）的首席，这些社团组织都是纯民间组织，唯其如此，也佐证了吴昌硕是海派书画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王一亭却自甘作为副手执行帮衬，甘当绿叶。

吴昌硕对王一亭也是相当信任、支持的。民国时期，各种自然灾难频发，而王一亭作为上海慈善界的领导人，是充分将书画作为载体来赈灾救济、行善于世，吴昌硕对此是密切配合。1914 年 11 月，由王一亭发起的上海孤儿院筹募经费菊花会开，吴昌硕拿出了自己的精品之作。11 月 8 日的《时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称赞吴昌硕、王一亭、李瑞清、高邕等人“亦是徵国人之热心慈善也”。1915 年 10 月，为资助上海龙华孤儿院，缶翁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亲自由王一亭相陪走访拜望了不少海上书画名家，如郑孝胥在 10 月 19 日的日记中载：“夜，赴吴昌硕之约于东南部春家，晤王一亭，请为孤儿院书纸数幅以供卖票开彩之用。”1919 年秋，豫鄂皖苏浙五省暴发水灾，灾民多达数百万，情况相当危急，已年届 76 岁的缶翁闻讯后连夜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自费印刷出版，在第一时间投入赈灾义卖。1925 年 8 月，吴昌硕正发肝病。疼得夜间难以入眠，但他还是强撑病体，作巨幅山水及花卉中堂赈灾湖南。正是在吴昌硕、王一亭的带领下，海派书画家群体团结一致，协作赈灾，成为当时全国一支重要的慈善团队。

书为大道，画为济世，艺为公器。吴昌硕、王一亭及整个海派书画家群体间的友谊交往，贯穿着一种家国情怀与道义精神，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与担当使命。如被尊为“浙东第一石”的《汉三老碑》于 1921 年被人带到上海，一个日侨欲以重金购之运往日本，吴昌硕悉知后不顾自己病臂发作，率先作画义卖，并亲自撰写募捐文告，王一亭紧密配合，四处奔走。海派书画家 60 多人参与捐画捐自己的藏品义卖，终募齐了 8000 元巨款将石碑赎回，后又在西泠孤山之巅建石室保存，缶翁后作《汉三老石室记》以讴歌此义举。1925 年 5 月 30 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上海美专学生来到吴昌硕家中募集，吴昌硕儿子吴东迈表示吴昌硕老人已年迈且多病，由他自己提供画作。平时耳聋的吴昌硕此时却一点也不聋，亲自作画，82 岁的老人抱病举笔，挥洒丹青。正是在缶翁的率先垂范下，康有为、章太炎、曾熙等元老级的书画家纷纷捐画，吴昌硕还满怀悲愤地写了长诗《五卅惨案》：“烽火逼天天昏黑，天光斜射海苍赤。炮声一发弹雨激，饮弹之人涨阡陌……”从中折射出了海派书画家浩然正大的爱国情怀与义薄云天的高风亮节。

“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这是吴昌硕当年书赠王一亭的对联，生动而深刻地概括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是有共同的“风波大道”之追求，又有相互的“尘土至情”之温暖。海派书画家正是以此不仅打造了一个画派的辉煌及艺事的鼎盛，而且留下了不少友善互助的佳话。如当年王个簃到上海时，生活无着，是吴昌硕把他请到家中当家庭教师，让这个青年才俊日后大展宏图。又如晚年的沈曾植贫病交加，是缶翁请王一亭一起到沈的“海日楼”看望，并慷慨解囊。沈辞世后，又是他们出钱为其料理后事。对于刘海粟所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王一亭不仅亲自参与教学，而且作为校董的他时常为学校募集、捐献资金。1923 年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上海停云书画社成立，而王一亭就是该社的主要捐助者。对于海派书画家中的不少人，王一亭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如曾熙过世后，其家属想编画册，但苦于无人担任编辑，王一亭就及时地请了蔡逸民，并亲自参与，编辑出版了《曾农髯遗迹》画册。正是在吴昌硕、王一亭的共同努力引领下，海派书画家之船不仅没有说翻就翻，而是同舟共济，驶向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新航程。

多年来我们较多关注的是海派书画家们的笔墨创作与艺术成就，而他们间的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关注社会的精神却被忽略或遮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宝贵的历史资源和优秀的群体传统，更是一种软实力的彰显。对于海派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家底，我们是应当发扬光大的。

（作者系高级编辑、艺术评论家）